

论历史虚无主义对民族国家身份认同的危害及应对策略

侯 丽 羽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思想政治理论教学部,河南 郑州 450015;
中国社会科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2488)

摘 要: 民族国家的身份认同以历史、文化、价值观和共同理想为根基,感召个体形成连续一致的集体记忆和共同想象。历史虚无主义否定中国近现代历史,遮蔽对“我们从哪里来”的认识;贬低民族文化,模糊“我们何以成为我们”的认识;抽空共同价值观,混乱“我们是谁”的认识;虚无共同理想,动摇“我们去向何处”的信念。破解历史虚无主义的危害,必须认清历史虚无主义实质,增强文化自信,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理想信念,从而提升民族国家的身份认同感。

关键词: 民族国家;历史虚无主义;身份认同

中图分类号: D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242(2018)01-0007-07

收稿日期: 2017-09-20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时期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的常态化机制研究”(15BKS091)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侯丽羽(1980—),女,河南南阳人,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思想政治理论教学部讲师,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作为一种错误的历史诠释观,历史虚无主义借“重新评价”之名,以主观臆断和任意否定近代以降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为切入点,以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合法性为政治诉求,虚无、否定和歪曲自己的历史、民族和文化。习近平指出:“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场历史悲剧。”^①2017年初,《人民论坛》公布的国内外值得关注的十大社会思潮中,虚无主义凭借其关注度、活跃度和影响力,居于其中。历史虚无主义是虚无主义最主要和危害最大的表现形式。近年来,学界对历史虚无主义的研究愈发深入,主要集中在对其渊源流变、实质危害、深刻教训和破解策略这些方面,形成了蔚为壮观的研究成果。但从历史虚无主义对民族国家身份认同的危害这一途径来展开的研究,尚付阙如。

民族国家(nation-state)是现代国家体系最普遍的形态,奠定了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基础。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民族国家包括两种类型,其一是像西欧这样的单一民族构成的国家,其二是像俄罗

斯和中国这样由较为复杂的民族成分形成的“多民族国家”。而且,绝大多数民族国家属于后一种类型。依照这种划分方法,中国是典型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身份认同是个体在自我认知的基础上认可所属群体的身份,并由此产生依赖的情感体验及相应的行为模式。民族国家的身份认同意味着个体把依恋的情感投射到民族国家这一情感综合体之中,“享受其成功,想象其未来发展,抛却其焦虑,拒绝其他选项的问题”^②。从逻辑上来讲,民族国家的身份认同指涉两个层面:客观层面上,要求民族国家借助国家机器维护其制度安排,使个体获取属于政治共同体的身份;主观层面上,个体要依靠民族国家的历史、文化、价值观和共同理想,获取文化心理上的归属感,认同民族国家共同体。这两个层面缺一不可,有机统一。外在“身份”一般通过制度安排和社会舆

①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

② 尼克·史蒂文森编,陈志杰译:《文化与公民身份》,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第103页。

论来产生,但只有个体内化这种“身份”并形成意义,认同才能最终完成。

社会关系彰显了人的本质,构成个体对所属群体认同感的基本来源。马克斯·韦伯指出,人是悬在他自己所编织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作为现代个人最重要和最基本的集体认同,民族国家的身份认同是这个意义之网的基本结构和重要线索。民族国家身份认同包括的基本问题有:“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何以成为我们?”“我们将向何处去?”对这些基本问题的回答要依赖民族国家的历史、文化、价值观和共同理想这些基本要素,从而形成连续一致的集体记忆和共同想象。历史虚无主义试图抽掉民族国家认同感所依赖的这些基本要素,造成历史的虚无化和意义世界的坍塌,导致个体与民族国家情感的疏离,从而在文化心理层面动摇民族国家身份认同的根基。

一、历史虚无主义的主要表现

历史虚无主义集中表现在对中国近现代历史、民族文化、共同价值观、理想信念的否定上,而且在否定维度上相互借力和支撑,形成内在的必然逻辑。

(一)否定中国近现代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

历史虚无主义对革命意义的否定,集中表现为“告别革命论”。自20世纪末有人提出“告别革命论”之后,对革命意义的否定,一时成为学术界的时髦。“告别革命论”把近代中国社会的革命说成是少数革命家在“激进主义思潮”影响下“制造”的产物,是“百年疯狂与幼稚”,造成了中国社会不必要的牺牲,延缓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这种观点认为若能放弃革命,自觉引进西方文化,中国早就立于世界强国之林了。“告别革命论”把革命视为一种破坏力量。若说是破坏力量,革命破坏的是严重束缚了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关系以及由此决定的上层建筑。正如毛泽东所言,若无革命,“中国就不能发展和进步,中国就有灭亡的危险”^①。除此之外,历史虚无主义还否认中国近现代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否认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斗争的正当性。这是历史虚无主义以学术研究之名设置的“理论陷阱”。历史虚无主义无视近代中国社会已经山穷水尽,在列强入侵、山河破碎的近现代中国,救亡图存和变法革命才是最大的政治这一现实,否定近现代中国社会性质、否定近现代中国革命的必要性,得出的结论要么是“侵略有功”,要么是发展资本主义才是唯一合理的出路。近几年,借助网络媒体的勃兴和大众文化的娱乐化倾向,历史虚无主义以“无厘头”“恶搞”的话语形式,不断抹黑、戏说、调侃革命英

雄人物。江姐、狼牙山五壮士、邱少云、黄继光、董存瑞,这些革命英雄人物被黑得体无完肤。与此同时,对一些已经盖棺论定的反面人物进行“重新评价”,还原“历史真相”。比如,2016年,互联网上对西北封建军阀马步芳的“重新评价”,罔顾其残忍杀害红军西路军的罪行以及残酷剥削和镇压藏族同胞的事实,拿着一把显微镜,在马步芳身上寻找生活或者性格上的优点,又用放大镜把其描绘成一个温情的、“通晓韵律”的抗日英雄。

否定革命的结果必然是否定作为革命必然逻辑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道路。始自1956年的社会主义建设,虽然历经挫折,但也取得了巨大成就,建立了相对完整的工业基础和国民经济体系,为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有益探索和必要积累。历史虚无主义在对待社会主义建设时选择性虚无,无视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夸大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曲折和教训,甚至杜撰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所谓的“人祸”,编造出“非正常死亡”数据,把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探索视为完全失败的过程。夸大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建设中的局部的、阶段性的错误,是同对党及党的主要领导人的恶意评价紧密相连的。一方面攻击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之前遵循的是“国家威权史观”,中国共产党自己在搞“历史虚无主义”;另一方面对党的主要领导人求全责备,尤其把矛头指向毛泽东,试图通过无限扩大毛泽东的晚年错误来否定新中国前三十年的成就,从而否定毛泽东的历史贡献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

历史虚无主义否定中国改革的进程。1978年,中国社会进入崭新的历史时期,即改革开放阶段。近四十年来,改革成就举世瞩目,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奠定了强有力的实践基础。在社会主义改革不断向纵深阶段推进的时候,历史虚无主义制造了意识形态领域不和谐的杂音,打着“解放思想”的幌子,否认中国社会改革的性质、必要性和成果,假借“反思历史”的名义,反对四项基本原则,从而达到动摇立国之本的目的。

(二)贬低民族文化

历史虚无主义必然导致民族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文化是历史的产物,历史是文化的延伸”^②,历史虚无主义刻意渲染中国人的落后性,对民族文化采取虚无、轻蔑的态度。从历史渊源上考察,历史虚无主义与“全盘西化论”如影随形,相互呼应。陈序经在20世

^① 《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32页。

^② 孟威:《抵制“英雄诋毁说”“历史虚无主义”的网络逆袭及其克服》,《人民论坛》,2015年第15期。

纪30年代就声称：“今后中国文化的出路，惟有努力去跑向彻底西化的途径。”“西洋文化无论在思想上，艺术上，科学上，政治上，教育上，宗教上，哲学上，文学上，都比中国的好。至于在衣，食，住，行的生活上头，我们更不及西洋人的讲究。”^①这些论调的逻辑结果就是抛弃民族文化，全面拥抱西方文明。胡适也主张解救中国文化的唯一出路是“西方化”，“西方化”的具体方案是仿照“美国模式”。到20世纪80年代末，某电视专题片将中华民族丑化为“丑陋”“奴性”“愚昧”，宣称中华文化是一种“劣等”的“黄土文化”“孕育不了新的文化”，中国走向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唯一出路是融入西方“海洋文明”，全盘接受“西化”。时至今日，一些网络“大V”、意见领袖，以西方文明为出发点和参照系，丑化中华民族，贬低中华文明。一些影视作品在对经典著作的“阐发”与“普及”上，在对历史题材的“演绎”和“创新”上，不断娱乐化和污名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最有价值的精神品质和文化基因。历史虚无主义否定中华文化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条件及时代背景，罔顾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在世界文明格局中的独特地位及演进逻辑，抽空中华民族文化建设的内在根基，造成自我矮化与精神殖民，使中华文化发展前景晦暗不明。

（三）抽空共同价值观

历史虚无主义对当代中国社会共同价值观之消解通过转换研究范式和用单纯概念来解释消极行为的手法来完成。一方面，历史虚无主义转换研究范式，摒弃价值尺度的客观性。美国哲学家、科学史家托马斯·库恩最早提出研究范式的概念。研究范式以多元文化主义的认识论为基础，倡导多元对话和多种知识标准，成为人们解释各科知识发展的重要理论基础。历史虚无主义挪用甚至歪曲此概念，试图用现代性进程来代替革命进程，把革命史同现代化史对立起来，用“现代史观”取代“革命史观”，借以否定整个中国近代史。经过所谓“研究范式”的转换之后，现代化就成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唯一要求和主题，而革命则成为制造社会动荡、破坏社会稳定、阻碍现代化进程的罪孽。“研究范式”转换的结果是抽空历史发展的客观基础，使价值尺度失去了客观性。这是历史虚无主义借学术之名设置的又一“理论陷阱”，成为“告别革命”论的主要理论依据。另一方面，历史虚无主义用概念分析来解释消极历史行为，抛弃价值的积极导向。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与判断都有一定的立场预设，是对“善”与“恶”的回答，对个体的价值选择起到导向作用。历史虚无主义善用大而无当的概念来解释历史行为和评价历史人物。比如，在《走向共和》这部堪称历

史虚无主义标本的电视片中，剧作者把慈禧太后、袁世凯、李鸿章等人的行为冠以“理性”“自由”的标签，用抽象概念去研究历史和评判人物，抽掉价值观的社会基础和时代内涵，从荒诞的非价值立场出发，遵循“好人不好，坏人不坏”的模式，无视民族国家的利益，导致价值判断与民族国家的发展要求相去甚远。“一个舆论或一个产品往往与一种普遍的、模棱两可的但是极其流行的概念或信念有关。”^②历史虚无主义用概念来裁剪历史和评判现实，没有看到“全部问题只在于从现存的现实关系出发来说明这些理论词句”^③，而不是用空洞的理论词句去说明现实关系。

（四）虚无共同理想

历史虚无主义从历史处撕开缺口，并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有着明确的政治目的和利益诉求。否定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文化、价值观，其目的在于改变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和基本道路，按照西方模式和价值观改造中国，为中国未来另觅自由主义道路制造根据和理由。历史虚无主义对社会理想之否定集中体现在虚无马克思主义和否定社会主义两个方面。日裔美籍学者福山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中宣称：“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并由此构成‘历史的终结’。”^④自由民主制度终结了历史，其言外之意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已经走入了历史的死胡同。历史虚无主义还声称，马克思主义“显然脱离了启蒙的思想路线，陷入历史虚无主义了”“把一个不存在的、仅仅是想象中的共产主义作为评判事务的唯一标准，不仅否定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这个漫长的人类历史，也否定了现实世界中的文明榜样”。^⑤在当代中国社会，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思想，社会主义是基本发展模式和社会理想，历史虚无主义通过否定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来否定中国社会发展的共产主义取向。

二、历史虚无主义对民族国家身份认同的危害

民族国家是时空的集合体，不仅有独特的政治

- ① 陈序经著，余定邦，牛军凯编：《陈序经文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8—9页。
- ② 亚历克斯·蒂奥著，丛霞译：《大众社会学》，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2年，第491页。
- ③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75页。
- ④ 弗朗西斯·福山著，黄胜，许铭原译：《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页。
- ⑤ 尹保云：《要警惕什么样的历史虚无主义》，《炎黄春秋》，2014年第5期。

和明确的领土边界,也有前后相继的历史文化,这两种不同的结构和原则融合在一起,共同构成民族国家身份认同的基础。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这个原理是公认的。然而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这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①任何民族国家都有自己居于其中的气候、土壤、矿藏分布等自然环境,从而构成物质生产基础。这些物质生产基础以及由此形成的生产方式决定了民族之间的差异。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民族国家是历史范畴,始自于中世纪末期与资本主义初期。与资本主义社会相伴而生的,是现代性的兴起。与中世纪以神为中心的世界观相反,哲学现代性的特征是把人居于世界中心,主体成为一切知识和万物的参照系。在对自我的检视和与他人的比较中,自我意识得以显现,内群体与外群体的边界日益清晰,才有了“我们”与“他们”的差异。这种边界和差异解释了民族国家的独特性,形成民族国家认同的基点。历史虚无主义对这些基点一一破坏,其危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遮蔽“我们从哪里来”的认识

作为一个社会主义民族国家,中国有自己的独特历史文化,这对形成民族国家身份具有决定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明确指出:“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②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程与成果是当代中国历史的主线和主题,构成了中国晚近最有影响的集体记忆。这些集体记忆承载群体情感,形成群体相似性的基础。“所有的认同都是在一定的时空系统中人们历史活动的过程和产物”,^③连贯一致的历史在时间维度上回答了“我们从哪里来”这一问题,也为回答现在“居于何处”、未来“走向哪里”提供了历史逻辑。

“欲去其国,必先去其史。”历史虚无主义任意裁剪和歪曲历史事实,得出自相矛盾的结论。比如在叙述和评价狼牙山五壮士、雷锋、董存瑞这些民众耳熟能详的人物及其事迹时,采用戏谑、反讽、拼接的手法,颠倒既定知识体系和传统认知模式,使个体无法从历史经验中追根溯源、确定轨迹,助长社会怀疑一切的风气。这种怀疑一切的风气由来已久,在近十几年中愈发盛行。解构主义、后结构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等思想中,诸如“人之死”“主体之死”和“作

者之死”这些影响深远的口号不断出现,与历史虚无主义怀疑一切的精神实质有契合之处。

怀疑一切,无法对过往做出合乎事实和逻辑的回答,破坏了民族国家身份得以生成的集体记忆,引发社会犬儒主义心态盛行。犬儒主义,这个源自古希腊的概念,几经意义变迁,依然保持了其基本理念,即对于世界的不信任和拒绝,对原本值得信任的人和事持怀疑主义态度。犬儒主义“以不相信来获得合理性”^④的社会心理,对于民族国家的身份认同有着釜底抽薪的负面影响。当一个人不再相信一切的时候,任何真理、知识和价值都成为怀疑和颠覆的对象。在伦理道德层面,对社会的不信任情绪日益蔓延。2016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6)》显示,仅有约三分之一的人认为社会上大多数人值得信任,有将近四成的人认为社会上大多数人是不能信任的,人们尤其对有钱人、有权人以及单位领导或老板等混合性交往对象表现出更为多元、复杂、矛盾和迷茫的心态。^⑤各式文学作品、影视作品用戏谑、拼贴、混杂等方式,肆意地“调侃崇高、扭曲经典、颠覆历史,丑化人民群众和英雄人物”,^⑥戏说和改写现象层出不穷。这种戏说和改写不仅针对文本,其要害是否定和颠覆了文本背后的话语秩序、道德秩序和文化秩序。人们缺乏对待历史的严肃态度,自然也缺少追求客观历史真相的兴趣,缺失获取历史真实的能力。由于没有“非如此不可”的信念,民族国家形成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也受到质疑,无法对“我们从哪里来”这一问题做出客观解答。对历史不再信任,无法追根溯源,便无法确定此时坐标,无法指向明确未来。

(二)模糊“我们何以成为我们”的认识

文化的性质、内容与范围具有地域性质。文化是“与人们看待和解释世界、把自己组织起来、处理自身的事务、提高和丰富生活以及与在世界上定位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47页。

②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7月2日。

③ 韩震:《论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及文化认同——一种基于历史哲学的分析与思考》,《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④ 陶东风:《大话文学与消费文化语境中经典的命运》,《天津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

⑤ 高学德:《2016中国社会信任调查报告》,王俊秀主编:《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6)》,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22页。

⑥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5日。

自身等有关的有机的和动态的整体”。^① 不同的民族国家都有其自身的文化要素和特征,形成相对稳定的民族文化系统。民族文化的核心部分是可以传承的文化基因,与其他民族相区别的独特标识,是长期发展、渐进渐改和内在演化的结果,是民族国家历经磨难仍然屹立不倒的精神支撑。身份认同并非空洞的符号,它依赖于个体的定位和态度。“对一个社会、一个群体或一个人来说,文化是借助内聚力来维持身份认同的持续过程。”^②作为民族国家意义化实践的观念凝结,民族文化形成了个体的言说场域和立场,是身份认同的基本预设,从文化维度上回答了“我们何以成为我们”这一问题。个体在民族文化中获得记忆连续性,产生心理依恋,寻找精神寄托,安享“在家的感觉”,获得心理层面上的归属感。

虚无民族文化,其畸形果实就是使中国社会在文化上被连根拔起,日益丧失自己的民族文化身份,瓦解文化自信的根基。“作为文化发展中的集体精神状态,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自信状况,现实地反映着并深深地影响着其文化发展的实际进程和客观态势。”^③在中华民族的发展进程中,文化的命运与民族的命运始终紧密相连。对民族文化,尤其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是让中国人自信起来的重要文化来源。文化自信的构成有着不同方面,对本民族文化历史发展和现实境遇的理性认知、对已有文化成就的尊重、对文化前景的信心都是重要的考量维度。“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④文化“断根”不断累积民族自卑感,丧失民族国家走向兴盛的底气和定力。在丧失底气与定力的迷落心境中,个体自然无法正视也不愿正视自己的民族国家身份,其结果要么是屈从于异质文化,要么是固步自封于世界文明潮流之外,无法正确回答“我们何以成为我们”这一身份认同的基本问题。

(三) 混乱“我们是谁”的认识

价值观是对生活目标的持久信念,属于上层建筑范畴,汇聚了群体的价值共识,与人们的现实利益休戚相关。按照社会认同理论,身份认同的基本假设是群体成员拥有相同的价值观,居于支配地位的群体支配价值观,个体通过认同价值观中蕴含的行为规范而获得社会认同。认同民族国家的价值观意味着个体在价值观问题上采取立场的问题,及要承担何种义务、履行何种责任、享有何种权利的问题。这些问题在精神维度上回答了“我是谁”“我应该怎么做”,是对群体身份的认知,形成道德责任的基础。当代中国的价值观是中国作为民族国家所表达的价

值共识,对个体的价值判断和价值行为起到导向作用。

历史虚无主义混淆价值判断标准,摒弃价值尺度的客观性,最终失去善的价值导向,导致价值相对主义甚至虚无主义盛行。“一旦人切断了和过去的联系,他就不能逃脱未来所拥有的最终的虚无感。”^⑤价值相对主义认为,不存在绝对正确的价值判断,价值作用是否有效发挥,要判断其特定的文化和历史语境。价值相对主义的极端化会导致价值虚无主义的盛行。价值虚无主义是现代化进程中最严重的精神危机,使“价值自身成为主观化、相对化的存在……从而引发了精神价值与意义世界的萎缩,变得空洞抽象,了无生趣”^⑥。尼采宣布“上帝死了”,无限放大了人性中的放纵形象;韦伯看到终极价值消隐之后,相对主义的“诸神之争”;海德格则则将虚无主义视为精神的“无家可归”,再也无法“诗意地栖居”;萨特、福柯指出了人类精神之渺茫;后现代主义者则彻底颠覆权威,瓦解一切坚固常识。价值虚无延伸到道德生活中,便是造成观念上或心理上的无所谓态度,实践或行为上怎样都行,滋生出陌生、疏离,甚至是冷漠无情的社会心态。近年来,社会生活中的公共道德事件,比如彭宇案、小悦悦被碾压事件,都是这种心态的外部呈现。这种冷漠心态反映出个体对所属集体安全感的丧失。安全感是健全人格中最基础和最重要的部分,是人的心理健康发展的重要方面。马斯洛把安全感视为继生理需要之后的最重要的需要,是对秩序、体制、法律、界限等的依赖和对恐吓、焦躁、混乱的规避,具体表现为依赖感、稳定感、归属感。只有安全需要得到有效满足,人才会产生爱、情感和归属的需要和可能。

民族国家是集体的最基本的形式,为个体提供的依赖感和归属感是一种“本体性安全”,是一种人对物产生的可靠性感受,确认自身身份具有连续性和一致性、所处环境具备恒常性和稳定性。弥漫

① D. 保罗·谢弗著,许春山,朱邦俊译:《文化引导未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51页。
② 丹尼尔·贝尔著,严蓓雯译:《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6页。
③ 沈壮海:《文化自信之核是价值观自信》,《求是》,2014年第18期。
④ 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25日。
⑤ 丹尼尔·贝尔著,严蓓雯译:《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52页。
⑥ 刘宇,秦小兵:《论现代社会价值的虚无主义及其扬弃》,《江汉论坛》,2015年第4期。

于社会的价值多元和虚无具有很强的腐蚀力和破坏性,稀释个体与民族国家的关联,使人们丧失精神上的安稳归宿,不断问询:我们是谁?历史将走向何处?一切晦暗不明,无迹可寻。

(四)动摇“我们去向何处”的信念

民族国家,不仅是一个政治共同体,也是一个信念共同体。作为信念共同体,民族国家需要用共同理想来描绘未来图景,回答人生的目标问题,表达对未来的期盼和希望。“任何一种期盼和希望,都是人们依据在实践中形成并认同的一定价值尺度对现实的‘自我’或‘社会’进行深刻理性批判的产物,都是人们基于对现实的不满而产生的对未来的‘新自我’或‘新社会’的憧憬和设想。”^①这种憧憬和设想建立在自我和社会关系的理性批判的基础之上,把自我认知与社会期待融合起来。民族国家的身份认同不仅要解决“我们从哪里来”和“我们是谁”的问题,也必须回答“我们走向哪里”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就是处理个体与民族国家关系的问题,是把个人命运与国家前途结合起来的问题,是回答“我们去向何处”的问题。共同理想反映了民族国家的“共同利益”“共同追求”和“共同愿景”,体现了民族国家成员的整体利益,离不开个体的身份定位和责任承担。

历史虚无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及社会主义否定的必然结果是社会信念的颓废。信念是人们对某种理想或者思想坚信不疑并积极实践的精神状态。当前社会生活中,个体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的信念表现出矛盾和困惑心理,注重近期理想轻视长远理想、注重功利化的个人理想轻视社会共同理想的倾向明显。颓废的理想信念无法摆正自我和社会、现实和未来的关系,无法科学回答“我们将向何处”的问题,危害个体对民族国家的身份认同。

三、采取科学方法破解历史虚无主义对民族国家身份认同的危害

针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危害表现,根据民族国家身份认同形成的基点,采取科学方法来破解其危害。

第一,加强对历史虚无主义的理论研究和批判工作。历史虚无主义理论本身有理论外衣,有“反思”之名,有步骤有策略,深具迷惑性。但任何理论如果缺乏严密的逻辑与科学论证,自然会失去阐释力和说服力,历史虚无主义也不例外。其一要认识到历史虚无主义是唯心主义在历史观问题上的表现。历史虚无主义以“范式研究”为名,以政治诉求来裁剪历史,违背实事求是的历史研究原则;片面引用史料,其解释模式暗含一种去整体化的思维方式,违背全面系统的历史研究方法;抛弃阶级分析这一

研究历史的“显微镜”和“解剖刀”,用抽象人性来分析人物和评判事件。这些做法阻隔了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的逻辑关联,违背了唯物史观的根本原则和方法。其二要加强对历史虚无主义新变种,比如国家虚无主义、价值虚无主义的研究和批判工作。这些新变种的危害更深入、更持久和更隐蔽,也是理论研究和批判的重点对象。其三要认清历史虚无主义是意识形态斗争的实质。虽然冷战背景已经不复存在,但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斗争依然尖锐。对于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来说,意识形态问题依然是学术研究的主题。历史虚无主义超出“理论交锋”之范围,恶意妖魔化中国,诋毁国家政党形象,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合法性,这些尖锐的矛盾冲突与国内外一些对我国进行西化和分化的企图与行为是分不开的。其四要正视历史虚无主义攻击的社会矛盾。每一次社会思潮的泛滥都与当时的社会发展状况密切相连。历史虚无主义放大社会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的局部和阶段性错误,抓住民众关心的切身利益,深具迷惑性和欺骗性。因此,在对历史虚无主义进行理论批判的同时,要解决社会现实矛盾,才能维护好民众切身利益,从而使历史虚无主义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第二,增强文化自信,提升文化认同。民族国家的身份认同与文化认同具有内在一致性。文化自信回答对“我们何以成为我们”这一问题做了文化心理层面的解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备以文化人的教化功能,是中华民族的独特精神标识和文化基因。如何重塑文化自信,提升文化认同,在面临历史虚无主义冲击时依然能够保持足够定力,这是当下面临的一个迫切问题。一方面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根据“新的历史特点”,赋予其时代内涵。同时,还要区别对待、辩证扬弃中华传统文化的糟粕,处理好继承和创造、发展和转化的关系。另一方面要下大力气来进行传统文化的体验和实践,通过采访、调查、访谈等形式来深度接触和体验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刻内涵,使其中蕴含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内化为生活态度和精神品质,外化为道德行为和生活习惯。

第三,提高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夯实对民族国家的道德责任基础。民族国家共同的价值观回答了“我们该如何做”这一重要问题,是个体承担道德责任的认知和情感基础。在公共环境中,如

^① 吴潜涛:《正确理解理想信念的科学含义》,《教学与研究》,2011年第4期。

果对待他人冷漠、说谎、不信任,处事急功近利,根本谈不上对所属群体的认同,自然也没有对民族国家的身份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代表社会共识的最大公约数,与普世价值有着根本的区别。我们既要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普世价值观的对比,还要进行对丧失主权国家最后遭遇的悲惨命运的比对教育,从而认清保持自身共同价值观念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同时,还要进行大众化教育。大众文化的勃兴是当代中国文化格局的现实状况。只有根据教育对象的身心特点,抓住要解决的主要矛盾,采取更具亲和性的作品和形式,注重参与性和实践性,才能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被民众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才谈得上真正的认同。

第四,加强理想信念教育,用中国梦来凝聚力量。历史虚无主义的重要一招就是瓦解理想信念,引发民众的“预期性焦虑”,从而使人们对“我们将向何处”这一重要的身份认同问题无法回答。新时期的理想信念教育,就是引导人们确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坚定人们在党的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①因此,理想信念的宣传教育突出表现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宣传教育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其历史必然性是什么?优越性又体现在哪些方面?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百废待兴到今日跃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

设在教育、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成就举世瞩目,这都是宣传教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有力证明。这些成就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崇尚公平正义,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只有弄明白了这些问题,才能减少历史虚无主义故意丑化和诋毁社会主义制度的危害,对外能解除疑问和误解、表达善意,对内能增进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用理想信念来凝聚共识、整合力量。

身份认同问题是世界性的文化研究热点,历久弥新。它是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人类检视“我们是谁”的思想产物。民族国家的身份认同,将历史、文化、价值观、未来图景等问题有机结合起来,进而将民族性与世界性、本土性和全球性的问题纳入理论视野。唯有解决好民族性和本土性的问题,才能解决好世界性和全球性的问题。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刻,这也是强化个体认同民族国家身份的最佳历史契机。在这关键时刻,我们既不能做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能做文化虚无主义者。我们要识别历史虚无主义的谬论,拨开其制造的历史乱象,还原被遮蔽的历史真相,从而认清来时之路,明确现在的坐标,坚定未来的方向,完成民族国家身份认同的蝉蜕之变。

^① 习近平:《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人民日报》,2012年11月19日。

(责任编辑 韩顺友)

On the Deformations of Historical Nihilism to the Nation-State Identity and Their Addressing Strategies

HOU Li-yu

(*Depart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Zhengzhou 450015, Henan, China; School of Marxism,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88, China*)

Abstract: The nation-state identity is established on the basis of history, culture, values and common ideals, which arouses consistent and continuous collective memory and common imagination in the subjects. The repudiation of the modern Chinese history by historical nihilists shrouds our cognition of “where are we from”. The debasement of national culture obscures our cognition of “how should we be ourselves”. The vacuuming of common values confuses our cognition of “who are we”. The denial of common ideals undermines our belief in “where will we go”. In order to solve these issues caused by historical nihilism, we must discern the nature of historical nihilism, enhance the confidence in our culture, and boost our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core socialist values, thus eventually leading to the improvement of the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nation-state identity.

Key words: nation-state; historical nihilism; identity